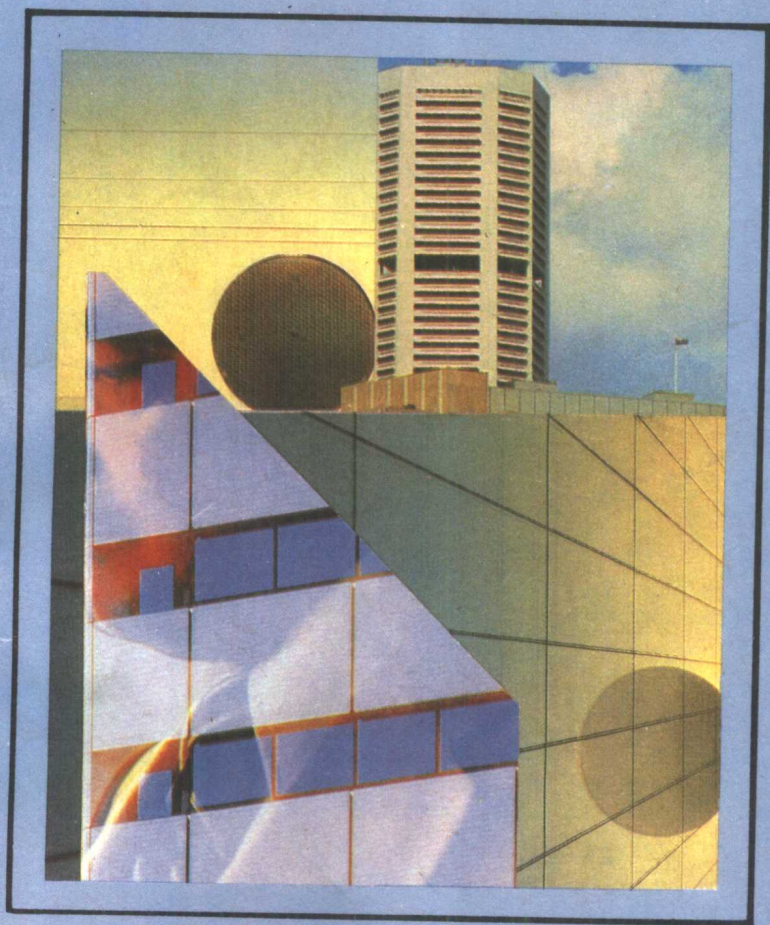




范恒山 著

国外

25种经济模式

改革出版社

国外 25 种经济模式

范恒山 著

改 革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053 号

责任编辑 张艳华

封面设计 陈璐生

国外 25 种经济模式

范恒山 著

*

改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城安德里北街 23 号)

东方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75 印张 200 千字

1993 年 3 月第 1 版 199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7-80072-349-6/F·198

定价 6.50 元



范恒山 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教授。曾就读于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了《社会主义理想经济模式》、《经济体制改革辞典》、《中国魂》、《弗里德曼文萃》等10多部著作和译著，发表过百余篇学术论文，其中有多部（篇）作品获奖。曾多次参与国家政策文献及重要理论课题的起草研究，被聘为著名国际经济组织的中方评审员。现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工作。

目 录

第一篇	国外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理论引评·····	(1)
第一章	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理论探索的发展过程·····	(2)
一	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理论探索的思想与实践基础·····	(3)
二	西方经济学者与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理论研究·····	(9)
三	前苏联和东欧学者对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理论探索 ·····	(17)
第二章	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理论探索特点的比较分析 ·····	(32)
一	50 年代前西方经济学者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理论特点的比较分析 ·····	(33)
二	50 年代后西方经济学者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理论特点的比较分析 ·····	(47)
三	50 年代至 80 年代中期前苏联东欧经济学者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理论特点的比较分析 ·····	(60)
第二篇	国外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理论简述·····	(116)

模式之一：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巴罗尼 的“资源最优配置”经济模式	(117)
模式之二：美国经济学家泰勒的“反复 试验法”计划经济模式	(121)
模式之三：美国经济学家柏格森等的“竞争 解决法”计划经济模式	(124)
模式之四：英国经济学家多布的“中央集中 解决法”计划经济模式	(128)
模式之五：英国资产阶级福利经济学派创立者 庇古的“强制分配”经济模式	(135)
模式之六：美国经济学家勒纳的“社会主 义社会价格机制”经济模式	(138)
模式之七：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的“中 央集权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142)
模式之八：美国康乃尔大学经济学教授范 尼克的“工人自治”经济模式	(148)
模式之九：美国经济学教授沃德的“伊利里 亚”式经济模式	(152)
模式之十：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杨克的“实用 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156)
模式之十一：著名东欧经济问题研究专家 诺夫的“可行的社会主义”经 济模式	(160)
模式之十二：比利时激进经济学派 经济学家曼德尔的“生产者 和全体公民的自我管理”经济 模式	(166)

- 模式之十三： 西方激进经济学派重要代表
贝特兰的“生产者对生产资
料和产品进行有效的支配”
的经济模式 (173)
- 模式之十四：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
的“新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179)
- 模式之十五： 瑞典著名经济学家林德贝克的
“自由——社会民主主义”混合
经济模式 (185)
- 模式之十六： 波兰著名经济学家兰格的“竞争
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193)
- 模式之十七： 波兰著名经济学家布鲁斯的“含
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 (200)
- 模式之十八： 波兰著名经济学家泽林斯基的
“管理程式”模式 (205)
- 模式之十九： 前捷克“经济改革之父”锡克的
“计划性市场经济”模式 (210)
- 模式之二十： 前捷克经济学家考斯塔的“计划
——市场”经济模式 (218)
- 模式之二十一： 前苏联著名经济学家利别尔曼
的“利润刺激或物质鼓励”经济
模式 (222)
- 模式之二十二： 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涅尔什的
“中央计划经济和市场机制有机
结合”经济模式 (226)
- 模式之二十三： 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内的
“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的经济

模式	(231)
模式之二十四： 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里斯卡的 “计划竞争市场”经济模式	(236)
模式之二十五： 前南斯拉夫理论家卡德尔的“自 治”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244)
注释	(254)
主要参考书目	(267)
后记	(273)

第一篇 国外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理论引评

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的探索和研究伴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而开始。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这种探索和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深入。站在不同的立场上,运用不同的分析方法,着眼于不同的角度,基于不同的动因,人们或者对实践中的社会主义进行分析研究,寻求实现其基本原则的具体途径;或者在批判现存制度或体制的基础上,设计理想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因而,在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上形成了形形色色的运行模式。科学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和非科学的、假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从正反两个方面提出了在探索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中值得重视或有待于研究的问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集中有关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及其研究的思想材料,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研究或批判,并根据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来验证,这对于在理论上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规律,在实践中探索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实现的各种具体形式,特别是寻找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就显得特别重要和十分必要。本书为读者提供了 25 种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较有影响和代表性的理论模式,并对之进行简要的评论,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在这一篇,我们将追溯社

会主义经济模式理论探索的一般历史过程,比较分析各类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理论,以展现这一探索的基本的发展面貌,揭示这一探索的不同的立场、角度、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及特点。

第一章 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理论探索的发展过程

事实无可争辩地表明,在既有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人们曾为探索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及其理想形式殚精竭虑,呕心沥血。这一努力,积累了大量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研究的理论文献,其中相当一部分已成为今天人们进一步进行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理论研讨和实践选择的、可资借鉴的重要材料和宝贵财富。从对经济模式涵义的不同理解出发¹,国外学者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研究设计,一般表现为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前苏联、东欧国家经济学者(传统意义上概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以所有制为重点所设计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第二,前苏联、东欧国家经济学者以经济运行原则(即以决策、动力、信息传递、经济协调原则)为重点所设计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第三,西方国家经济学者(传统意义上概称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以所有制为重点所设计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第四,西方国家经济学者以经济运行原则为重点所设计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这些反映着不同的阶级特性和思维特色的经济模式理论与思想,以不同形式、从不同角度构成并丰富了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理论探索的历史过程。那么,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理论的探索是

怎样发生的？这一探索所依靠的思想基础与实践基础如何？它呈现了什么样的进展轨迹？这是我们今天研究与设计理想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具体形态所不能不知的问题。本书对此作一些考察。

一 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理论 探索的思想与实践基础

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理论的探索，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基本规定的思想探索和实践探索的基础之上的。而对于社会主义的思想探索和研究源远流长。如果把社会主义当作仁人志士所构想的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剥削的一种理想社会，那么其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列宁曾指出：“许多世纪以来，甚至几千年以来，人类早已幻想过‘立即’消灭所有一切剥削”²。我国的古文献《礼记·礼运篇》记载了距今 2000 多年前的“大同世界”及关于大同世界的构想。与此同时，西方社会亦有人提出了理想的社会观。如果从社会主义思潮兴起算，对社会主义的探索距今亦有近 500 年的历史。英国思想家托马斯·莫尔在 1516 年出版的《乌托邦》（全名为《关于最完善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全书》）和意大利思想家托马斯·康帕内拉在 1602 年出版的《太阳城》，代表着社会主义思潮的发轫时期。而昂里·德·圣西门、沙利·傅立叶和罗伯特·欧文把这种空想社会主义推向最高峰。他们对社会主义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设想。特别是被马克思誉为“最伟大的智士”的欧文，系统地阐述了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但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

的。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前人的思想成果,把理论研究同革命斗争的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从而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成为科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阐明了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为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方向。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们并没有专门地、细致且系统地论述过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这一点他们大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者。尽管空想社会主义者在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中,也涉及到经济运行的一般特点,但其重点仍在于设想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具体规则与细节。马克思、恩格斯不想靠“凭空猜测无法知道的事情”来提出具体的、一劳永逸的方案³。但是,从他们所创造的科学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出发,依据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以及与其相应的事物的内部发展规律,他们还是想“尽力找出进一步的发展将循以进行的总方向”⁴。于是,他们自然而然地提出了共产主义的问题,而在穿插于其它问题讨论间的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系列论述中,他们大体勾勒了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模式的基本特征。这就是:第一,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建立了单一的全社会的公有制。这种全社会的公有制,在社会主义的初期,将采取国家所有制的形式,即由国家作为全体劳动者的代表直接占有全部生产资料。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国家的消亡,国家所有制将由表现为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所有制所代替;第二,社会有关机构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有计划的调节。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经营的一般格局是:根据社会 and 每个社会成员的需要决定生产什么;根据社会现实掌握的生产资源和生产能力决定生产多少;根据费用和效用的比较指数决定怎样生产。以当时社会较为简单的产业结构和工艺过程为出发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将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价值也不再成为衡量劳动耗费

量的尺度；第三，以劳动时间为尺度，按劳动者劳动的质和量，通过非商品交换的形式（例如发放劳动券的形式）进行个人消费品的分配。更抽象一点说，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实行公有制，经济计划和按劳分配的社会。这些特征构成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一般原则或基本规范，从而，构成了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基础，并最终成为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探索的主体思想基础。但是，这些特征的规定，有着特定的思想前提和严格的实现条件。考虑到这种寻找“总方向”的描述也有可能出现空想的成分，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反复告诫，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⁵。这种科学态度表明，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具体形式的设计，只能建立在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与资本主义对立的崭新的社会制度成为既定事实的基础之上。因此，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设计，是同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结合在一起的。换言之，社会主义经济的实际运行状况，成为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理论探索的实践基础。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俄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不出马、恩所料，社会主义一旦由理论付诸实践，人们就会发现，仅仅用一些抽象的或带有预测性的原则，无法概括丰富多彩的社会实际。当人们着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然而改造的形式和具体改造的发展速度并不清楚的时候，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一方面十分重视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奠基人的思想和虽然短暂但却极为珍贵的巴黎公社的实践经验，来确立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又试图根据俄国具体国情来探索贯彻这些基本原则的具体形式。根据俄国经济文化落后，大工业基础薄弱，小生产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他们拟定了通过“赎买”等形式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战略，“间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是，革命胜利初期，广大人民群众政治热情和革命热情的高涨，以及军事上的需要，使

人们认为，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条件下，完全可以采取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方法，即直接用革命的方法摧毁旧的经济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和分配制度的办法来建设社会主义。根据这种思想，人们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设想，即把全体人民组织在消费生产公社内，依靠建立经济关系实物化基础上的国家统一计划来组织生产和分配。这种设想因 1918 年夏天出现的险恶形势——国外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武装叛乱一齐向年轻的苏维埃政权袭来，相伴而行的还有严重的饥荒——而得到实施，并日益强化。这就是“军事共产主义”。它与先前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的理论设想间的巧合，以及它给苏维埃政权带来的军事上的节节胜利，使人们把它当成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正常形式⁶，从而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初模式。其主要点是：第一，最大限度地实行国有化。不仅绝大部分工厂企业被收归国有，私人工商业趋于消灭，而且在农村也开展了对富农的土地和生产工具的剥夺，进行了组织农业公社或集体农庄的最初尝试；第二，管理权力高度集中化。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下设的总局几乎垄断了企业的全部生产经营权，它们通过行政命令指挥企业活动。同时国家还在企业中推行一长制，通过直接任命企业经理来控制企业的管理权；第三，废除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交换，全部经济活动实物化、计划化、军事化。这集中反映在如下政策体系上：以军事强制为特征的余粮收集制；贯彻等级原则和社会原则的消费品配给制；劳动力的强制分配和义务劳动制；尝试按“劳动单位”领取报酬，以及对外贸易上的国家垄断等等。显然，这是一种高度集权的、完全排斥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作用、凭借行政强制和精神激励来推动经济发展的体制模式。在当时，它保证了战争的需要和广大劳动者最低限度的需要，从而使苏维埃政权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但是，由于把余粮收集制，配给

制一类军事强制措施当作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常办法,“没有保持一定的限度,不知道如何保持这个限度……做得超过了理论和政治上所需要的限度”⁷,也给苏维埃政权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严酷的事实,使列宁认识到:战时共产主义道路不是符合俄国国情的正确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到1921年春天已经很清楚了:我们用冲击的办法,即用简捷、迅速、直接的办法实行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的原则的尝试已经失败了”⁸。于是,苏维埃既存的社会经济条件被重新认真地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道路的选择再次退回列宁最初的设想上。经过实践的“试错”和深化,以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组织生产经营活动为重要特征的“新经济政策”,被确定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真正科学的道路,取代“军事共产主义”,而成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史上的第二模式。这一模式包括这样一些主要内容:第一,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成分多层次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通过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如租借制、租让制等)来恢复工业和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通过合作制全面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第二,实行“集中调节(计划),分散管理”的原则,即“在严格经济核算制基础上,授予国营工业联合企业以合理管理企业所需的全部行政——经济权力”⁹。在这种管理体制下,国家起整个国民经济的中心作用,对总体经济活动进行“全面指导和节制”,而不干预企业具体经济活动,企业在生产、销售、投资等各方面拥有广泛的自主权。国家计划部门的计划体现目标性和指导性,而不是指令性。第三,利用商品货币关系、自由贸易和市场机制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按商品经济原则组织经济活动,运用经济手段调节与控制市场;国家运用税收、价格、信贷等经济杠杆对企业实行间接控制;企业则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规律要求,面向市场开展生产经营活动;采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

做到“上面集中，下面实行农民的自由贸易”¹⁰。通过市场竞争，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最终把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关系从商品流通中排除出去。列宁这样评价“新经济政策”模式：“新经济政策不改变工人国家的实质。然而却根本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因为新经济政策容许建设中的社会主义同力图复活的资本主义，在通过市场来满足千百万农民需要的基础上实行竞赛”¹¹。随着新经济政策的施行，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工农联盟在新的基础上得到了巩固，从而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展提供了物质和政治基础。这样，在新的起点上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任务，自然而然地提上了议事日程，而紧张的国际局势和不时出现的国内动荡，更加加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尽快创造抵制外部侵扰与保持内部稳定的雄厚的经济基础的紧迫性。迫于特殊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同时一定程度上受到传统理论的束缚，特别是囿于马克思、列宁等人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存在商品经济的论述¹²，忽视前苏联的基本国情和实践中的新经验，斯大林等人最终摆脱了新经济政策道路，建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模式——以限制商品货币关系，排斥市场机制作用，实行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为重要特征的斯大林模式¹³。西方经济学家往往称之为“正统的命令经济”¹⁴，它成为后起的社会主义国家奉行的楷模。

随着“军事共产主义”经济模式的形成，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的理论研究也逐渐展开。特别是斯大林模式的弊端明显显示后，这种研究更趋广泛、系统和深入。除了对关于社会主义的质的规定，即对公有制、经济计划与按劳分配等规定的客观性、完整性作进一步的讨论外，更多地是集中在探讨这些质的规定的具体表现形式上，即主要探讨了如下一类问题：社会主义公

有制的具体存在形式,计划经济的特点及实现途径,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分配的特点及形式等等。而这些探讨反过来又导致了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乃至整个社会主义的质的规定的深入认识或重新认识。因此,在探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具体形式的同时,亦有关于社会主义的重新设计。当然,这些“社会主义”不一定是科学的社会主义。

二 西方经济学者与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理论研究

富有戏剧性的是,关于社会主义模式的讨论,首先是因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的责难,而在西方经济学界展开的。

资产阶级理论家对于社会主义的责难早就开始了。他们从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发展到直接论证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运行的不可能性。当社会主义还是一种意识形态时,他们便把矛盾集中对准了学社会主义理论。一部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借口马克思只是说明了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与危机,而没有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作具体的设计。比如说,没有说明社会主义如何进行经济计算,如何配置社会生产资源等问题,而否定社会主义在实践上的可能性。早在19世纪中叶,德国经济学家汉姆·H·戈森就臆断社会主义国家中央经济当局很难合理地组织经济活动。继此之后,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断言,合理的经济计算与资源的最优配置将随着财产私有制的消灭而消灭。1874年,法国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谢费尔在其《社会主义的本质》一书中,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能否合理地配置资源的问题。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下